

(1944.1.30–1945.12.25) 葉靈鳳的作品》及〈尋求新方向：《海光文藝》研究〉等。

梁懿剛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近年研究職務包括：年青人政治及社會參與意識、學習成績與社經背景關係、市區重建對居民影響。

李少恩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香港粵劇學者協會會長，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早年於香港聯合音樂院及中國四川音樂學院學習音樂理論，主修作曲。自1997年入中文大學音樂系研究院研習粵劇、中國和香港音樂，歷年發表大量相關文章，曾參與論文集《香港戲曲的現況與前瞻》(2005)編輯，著有《粵調詞風：香港撰曲之路》(2010)。李氏長期從事音樂教育工作，並參與教育局音樂科中小學粵劇課程發展，現任民政事務局粵劇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

梁寶霖 前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re)主任，現香港社會保障學會會長。

梁寶龍 香港工運史研究者。

冼基樺 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尤德爵士紀念基金海外研究生學人。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主修社會學。2010年獲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學位。研究範圍包括：中國社會、香港社會、東亞社會發展、文化產業等。從事的研究項目包括：香港電影業的興衰、香港藝術行政人員研究、香港戲劇界人力資源調查、東亞電影產業鏈的制度研究、華南左派電影組織研究。

## 導言：「左派」運動在香港

趙永佳、呂大樂

### 「左」的定義

「左派」一詞源於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後來廣泛應用於政治派別的分類之上。在政治分析用語中，「左派」指的是倡議改變現狀，鼓吹革命或激進的行動，通常站在反對派的立場來表達其社會、政治主張的一種意識形態或政治力量。而在十九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正面挑戰資本主義的過程中，「左派」或「左翼」通常又用以泛指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陣營中的政黨、社會運動及它們的支持者。

但當然，所謂的「左」是相對而言的。當左翼政黨革命成功，正式執政之後，它就成為了建制，而其意識形態也就變為了建制的一部份。而在這個發展過程之中，在原來「左派」的左方，通常會出現另一種「左派」，以左翼的角度來批判或挑戰「左派」。所以，所謂「左」的，還是「右」的，其實質意義要視乎具體的政治狀況而定。說到底，無論是「左」的還是「右」的，基本上都是一個標籤而已。

### 香港「左派」

以香港的情況而言，以上所講的就更為明顯了。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共產黨人及其支持者便有在英國殖民管治的香港有所活動，跟當時掌中國政權的國民政府進行鬥爭。而這種國共之間的政治鬥爭並未有因為中共於1949年取得政權而停止。事實上，剛好相反，於當時的國際政治局勢底下，在香港這處殖民地的土地上所進行的國共鬥爭，不單只更為激烈，而且更具政治上的含義。對中共而言，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既有團結廣大同胞、抗衡國民黨在香港建立反共勢力的意思，同時亦是反冷戰期間的圍堵的重要策略一環。而對已遷台的國民黨來說，香港這個華人社會是兵家必爭之地，是防止中共勢力進一步擴張的前線。在二戰後初期，親中共並且跟親國民黨陣營對抗的，稱為「左派」，而親國民黨或國民政府的，則稱為「右派」。

基於他們的意識形態及政治思想，「左派」除擁護新中國之外，還時常跟港英殖民政府唱對台，嘗試團結勞工階層，批判資本主義和殖民制度。而最大規模的動員與鬥爭，是1967年因所謂的「五月風暴」而起的武力反抗殖民統治的行動。「左派」稱那一場鬥爭為反英抗暴，換言之，他們的武力反抗是反抗殖民政府的暴力鎮壓。至於沒有參與其中的香港市民，則稱當年所發生的狀況為暴動。暴動過後，隨着政治形勢與需要的變化，「左派」調整了他們的路線和角色。首先，在反霸權的鬥爭中，港英殖民政府不是主要的鬥爭對象；盡量將群眾團結在愛國的旗幟底下，較諸反資反殖更為重要。而再發展下來，現狀不變的香港更是應該充份發揮其積極角色，協助中國從文化大革命恢復過來，進行四個現代化，逐漸對外開放。於是，「左派」一詞逐漸為「愛國人士」所代替，而這多少反映出他們自我定位的一些改變。

本書沿用慣常用語，稱呼這股社會力量為香港的「左派」。此舉既無貶意，亦沒有將他們視為激進政治、思潮的意思。這跟當時及後來另一些如「土共」、「港共」、「左仔」等包含某種否定或鄙視的稱呼並不相同。不過，我們亦希望指出，如上文已略有討論到的，稱他們為香港「左派」，並不就等於視之為政治思潮中的「左翼」。在目前香港社會的環境裏，愛國的「左派」其實都支持維持現狀，循序漸進，跟激進左翼思想大不相同，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時的傳統香港「左派」也不一樣。對於香港「左派」的分析，必須把他們放到具體的歷史環境裏，才能瞭解其思想及政治取向的意義。抽離於歷史來看香港「左派」，便很難明白究竟他們的言論、思想、行動，有些甚麼意思了。

### 感性經驗中的香港「左派」

香港大部份戰後出生的所謂「嬰兒潮世代」，相信在其成長期，都會對「左派」運動有一些經驗和印象。趙永佳於六十年代在灣仔堅拿道居住，「左派」組織、團體是他的成長回憶中一個重要部份。他的外婆在戰前從東莞來港，成為「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捲煙女工。戰後公司被納入「左派」系統，而她也加入了愛國工聯會陣營中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工會。公司舊址就改建成後來的南洋戲院，是他小時候看電影常到的地方。

後來他外婆自煙草公司退休，到銅鑼灣一家西餐廳做「洗大餅」的洗碗工作，又輾轉加入了「洋務工會」。洋務工會所組織的乃是在西式企業(多是服務業)中工作的職工。五、

六十年代，工聯會的組織工作做得很細緻，每年春節都有工會幹部來向他外婆這位老會員拜年。因此，在他的成長經驗中，「左派」組織是平常生活中的一個部份。例如羅素街(時代廣場現址)旁是電車車廠，電車掛上回廠的牌子，就是經波斯富街轉入這個車廠。而附近不遠，就是電車工會的會址。工會處於街上的舊樓之中，而當年那些樓宇的天台都是相通的，話說電車大罷工之時(所謂「羅素街血案」事件)，工人就是在工會天台上集會。他還記得曾在工會的天台上踢球，但卻完全不知道那個「球場」，原來曾發生工人運動中的重大歷史事件。

從他家向銅鑼灣方向走幾分鐘，就是波斯富街。現在的軒尼詩大廈，當年是一家「國貨公司」(應該是中國國貨公司)。而在國貨公司樓上，是工聯會屬下的「工人診療所」。六十年代的公共醫療系統非常落後，灣仔區的政府診所位於現在修頓球場旁邊的「貝夫人診療所」，由堅拿道過去路程比較遠，而且輪候的人又多，所以當他生病時，外婆通常都會帶他往「工人診療所」看病。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進入診所大堂，就有一幅毛主席的肖像及一塊大橫額，寫上「為人民服務」。外婆當年覺得「工人診療所」比政府診所還要好，常常告訴他說，診所的針藥很便宜，所以到那裏扎一針，很快便會痊癒。當然他是不太喜歡打針的，但小時候的病都是在「工人診療所」治好，卻是事實。

當然，對「左派」的記憶也不全是「和風細雨」的。到了1967年，「五月風暴」爆發後，他正在慶幸不用如常回校上課之際，當時分租家中「頭房」的一位在灣仔消防局對面店舖打工的店員，就曾被一枚消防局門外放置的炸彈所傷。外

婆在之後的大半月每天都要為他「煲湯」療傷。「為人民服務」的「左派」，同時也會傷及無辜。

對一部份人來說，跟「愛國組織」有所接觸，是很生活化的事情。

但對另一部份的人來說，則「左派」完全屬於另一個生活世界，既不瞭解，亦無接觸。

呂大樂在北角碼頭旁邊的「廉租屋」長大，住在同一層的鄰居之中，只有一戶是明顯地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他們家裏掛有毛像，日常生活亦似乎略有別於其他街坊，十分低調，彼此沒有甚麼往來。而在該社區內的家庭，基本上不談政治。但寧靜的日子不能避免的受到「六七暴動」的衝擊。屋邨的升降機內外都被人寫上「黃皮狗」、「打倒帝國主義」(是用簡體字寫的，當時是小二學生，看不懂當中的意思)。英皇道的僑冠大廈(華豐國貨公司所在地點)上空出現直升機，而同時就是因為戒嚴而不敢外出，但亦可嗅到催淚彈的氣味。從成年人的表情知道事態嚴重，但小孩子卻只是一知半解。他就讀的是聖猶達小學，後門靠近蘇浙小學。某天發生炸彈爆炸，有人命傷亡，而二年級班房窗口的玻璃都震碎了，結果特別休假一周。

在往後的日子裏，每天上學及放學例必經過國貨公司和「左派書店」，對於櫥窗上所展示大陸政治、經濟、社會近貌的照片，總是半信半疑。而事實上他亦沒有興趣去查個究竟。畢竟，對一名小學生來說，文革這個題目似乎太過沉重了。在日常的生活層次上，奉一般成年人勸喻，跟大陸有密切關係的，還是保持距離為妙——但有一點除外。對普羅大眾來說，他們日常生活中所享用的消費品，不少都是大陸國

貨。從英雄牌墨水筆、回力牌帆布運動鞋，到零食大白兔糖，統統均由國貨公司供應。對很多跟「左派」系統沒有甚麼聯繫的人而言，國貨公司就差不多是唯一的接觸點了。

在呂大樂眼中，「左派」是神秘的。在北角長大的他，可以說不可能沒有察覺到他們的存在，但彼此之間卻鮮有接觸；兩者各有他們的生活世界，在一般情況底下，互不相干。小時候讀的報紙是《星島日報》，每年10月隨報附送青天白日旗，年份是以民國的年曆為準。雖然他跟國民黨的、「右派」的系統沒有任何連繫，但在成長過程中所接觸到的主流，是以中華民國為中心的。一切有關「左派」的事情，均屬於主流以外。

可是，當他於香港大學讀一年級的時候，卻無意中經一位補習學生的介紹，成為了某間「愛國學校」的兼職教師。當時「四人幫」已倒台，而中國正從「毛時代」轉變過來。而香港的「左派」在追隨大陸於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方面的轉變時，思想出現頗多矛盾和混亂的地方。昔日批判與否定的事物、價值，重新獲得肯定，有時甚至成為新的目標。而在更具體的安排上，「左派」逐步開始先接觸、後投入於港英殖民政府所建立的制度、主流。以前(粗略地指1950至1978期間)「左派」差不多是一個完全自成一體、自給自足的社會系統，裏面有它的學校、活躍於不同行業的企業單位、報刊、文化機構及團體、街坊組織、工會、商會、體育團體等等，基本上可以完全獨立於殖民政府所建構的主流制度而運作。舉一個例，當時作為這個社會系統裏的青年學生，基本上可以跟建制無涉，毋須參與殖民教育及其公開考試制度，可以繼續升學，而日後到了就業和投入勞動市場之時，

亦有不同的僱傭單位可以配對。簡單的說，這個社會系統頗自覺的跟殖民制度保持距離，並以一種很不一樣的邏輯(例如它有別於香港社會普遍以市場掛帥的做法，重視意識形態)來運作。那樣的一個社會系統曾經是殖民制度以外的一種選擇，並且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例如對殖民地的批判，又或者被視為進步文化的代表)。對來自於系統以外，對其文化完全陌生的呂大樂而言，那一年的兼職教學生涯，可謂大開眼界。

開眼界的地方是，那次觀察提醒任何對戰後香港社會的分析，都不可以低估冷戰的政治環境的影響——在殖建制以外，還存在「左派」和「右派」兩股重大的社會政治力量。以上對「左派」的描述某程度上亦可應用到「右派」系統之上。要認識香港社會，必須瞭解左右兩派。

### 「左派」在社會分析中的位置

基於生活圈子和經驗上的差異，香港人對「左派」運動的認識，多來自新聞媒體，尤其是報刊。當然，我們可以想像有些人是自覺和主動的親近某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意見，那是一個自我選擇的過程。也有一些是自覺的跟「左派」和「右派」保持距離，嘗試尋找第三類觀點。但也有不少人會像趙永佳一樣，外婆是愛國工會老會員，但爸爸卻是「右派」集賢起落貨工會(曾參加省港大罷工)的「醫事顧問」；他家中讀的是《香港時報》，(除熟讀體育版的本地波經之外)對來自所謂「自由陣營」的論述最清楚。

有趣的是，在舊日冷戰底下的政治環境裏，親台的、屬於建制的言論往往可以中立、客觀的形象示人。我們不是說

「左派」沒有他們的問題(例如對毛近乎盲目的崇拜明顯地是個大問題)，而是想指出，當時不少從港英或親國民黨陣營的角度出發，來記錄和演繹「左派」的活動，當中存在政治上的偏見，而並非平衡的理解。這種情況在1967年暴動之後尤其明顯。整個「左派」的系統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理念，一是很簡單地視為別有用心，破壞香港的社會秩序、自由、安寧之輩，不然就根本不將「左派」放入當代香港社會發展和歷史當中，假設他們的存在最多也只不過是個小集團，而並無更重要之社會、政治含義。

而在學術界的社會政治分析中，亦有相似的問題。其中劉兆佳先生的重要著作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是香港社會學最早和最有系統的關於香港社會及政治發展的理論分析和模型。<sup>1</sup> 但他當時(七十年代末)撰作該書時的基本命題——為甚麼香港政治在快速現代化的過程中是如此「穩定」？——卻可說是忽略了戰後香港社會一片「昇平」的景象。殖民政府大大調整其管治策略，而當時國共之間的鬥爭亦開始未能回應社會上新的訴求，正是「左派」處於低潮的時候。以這樣的背景作為他的分析的參照，他形容香港政治為一個「低度整合的社會政治系統」(minimally-integrated social-political system)，顯然是缺少對冷戰政治環境所起的作用的分析，再而大大低估了之前國、共、港英三方纏鬥的政治意義。他所講的政治穩定，大致上是把國共政治鬥爭及相關的政治動員不包括在內的。他只是輕輕的提到那些衝擊殖民政府的政治行動未有動搖政治穩定，便不再作深究了。

1 Lau Siu-kai (1982),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我們念大學時，正是很多本地社會學家、政治科學家不約而同地以政治穩定為解釋對象的時期。但在當時我們幾個對香港歷史甚有興趣的研究生的眼中，對這套把「左派」運動「清洗」掉的論述有點摸不着頭腦。好像劉當時提出「功利家庭主義」(utilitarian familism)來解釋香港人的政治冷感，因為戰後南來移民普遍有「難民心態」(refugee mentality)，都抱着「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態度，遠離政治，埋首「搵食」，希望讓家人過一點好日子。但本書各篇文章的作者，正想指出忽視了「左派」運動的歷史位置，便很難全面瞭解戰後香港的社會、政治發展。香港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前的25年間的歷史，部份是一群愛國群眾懷抱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跟港英殖民政府和「右派」對抗的鬥爭史。缺少了「左派」這一頁，香港戰後的歷史便會顯得不夠完整。

如果忽視「左派」運動是一個問題，那麼眼中只有「左派」也是一種不足。周奕先生的著作《香港工運史》、《香港左派鬥爭史》可以說是「鬥爭史」的代表作。<sup>2</sup> 他曾在戰後初期參加愛國青年和工人運動，後來到香港《文匯報》工作至退休。他的左派歷史充滿愛國感情，除了本身是當事人並身臨其境外，亦搜集了大量文獻資料，對很多事件有細緻描寫，一定程度上填補了香港歷史的空白，平衡了以往從國民黨或港英角度出發的記事。不過，他的局限亦正正在於他幾乎完全從左派的角度出發，而且行文及史料來源的處理，都跟學術研究所要求的客觀有一定距離(當然，他亦沒有宣稱他寫的是歷史學術著作)。

2 周奕(2009)《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出版社；周奕(2002)《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文出版社，頁287。

再者，他集中在戰後至1967年「五月風暴」期間「左派」群眾和團體面對親國民黨右派及港英的抗爭，著墨於事件的再現，而非分析。還有他的著作對「五月風暴」後，尤其是中英談判以來左派組織的「轉型」也沒有太多篇幅。

對「左派」的論述，當然還有是「左派」組織所撰寫的組織歷史。大部份「左派」工會均曾出版紀念特刊，其中多數都有大事記錄；而個別「左派」組織更有比較詳盡的發展史的書寫，如洋務工會的《工在家國》，銀都集團的《銀都六十》，和最近工聯會所出版的《工聯會與您同行》<sup>3</sup>。對有興趣瞭解更多「左派」歷史的讀者，均屬有一定參考價值的刊物。

但畢竟那些刊物難以擺脫「正史」的寫法，對於以客觀態度重新建構「左派」歷史，並把「左派」運動的人和事放回香港歷史發展脈絡中並進行分析，仍嫌有所不足。<sup>4</sup>有見於此，本書各位作者辦了一個小型研討會，會上作過報告和交流之後，各自撰寫文章，促成此書。

## 本書的結構

在選題方面，本書包含了兩個「熱門」題目：一是關於「六七暴動」，另一則是有關「左派」工會。關於前者，葉

3 周文港、方慧賢、黃曉嵐(2011)《工在家國—香港洋務工會九十年史》，香港：和平圖書；銀都機構編，《銀都六十》，香港：三聯書店(香港)；香港工會聯合會(2013)《工聯會與您同行》，香港：中華書局(香港)。

4 一些研究生曾嘗試以「左派」機構、團體作為論文題目，並提出具學術意義和參考價值的分析。例如馮惠卿(1999)《一個理想社區的追尋：培僑中學46-97年文化社會學探索》，香港中文大學，未出版碩士論文。

健民所寫的「六七暴動的罪與罰」，乃以收藏於香港及倫敦的檔案文件為研究材料，重新瞭解當年抗爭的暴力程度，並反思殖民政府那種寧枉勿縱的處理手法。那些所謂在緊急狀態下所採用的非常手段，是否完全合乎法治精神，有其值得商榷之處。梁寶霖和梁寶龍寫「愛國工會：香港工會聯合會」，是從社會政治生態的環境來看工聯會的發展歷程。他們既看工聯會如何在急劇轉變中的環境裏尋找定位，回應勞工訴求，同時也嘗試分析它如何在政治夾縫中扮演一個頗為矛盾的角色。

在這兩個較為「熱門」的題目以外，我們選取了幾個較少人研究的界別和團體。這很大程度上是呼應前文所提到「左派」作為一個社會系統的觀點。在體育界，趙永佳、呂大樂和梁懿剛以愉園足球會為例以說明，這類社會團體在香港戰後歷史扮演的角色。在文學界，張詠梅以《文匯報》中一個「長壽」小說專欄《港Q正傳》來勾畫「左派」如何「想像」戰後香港的殖民與資本主義。而李少恩更以「南國粵劇團」和「左派」工人的業餘劇團運動來描述文藝活動對戰後「左派」運動開展、團結群眾的重要性。

一般有關香港「左派」的歷史討論，都集中在戰後五、六十年代的「社會主義建設期」至文革的階段。當然，對文革和「五月風暴」時期有較多關注，這不難理解，事關當時的政治形勢，對很多「左派」組織都有決定性的影響。如《港Q正傳》在「五月風暴」前便結束，而南國粵劇團在七十年代也開始淡出。但也有左派組織是堅持下去，並在組織、策略和活動上進行了轉型，因此本書也對六七之後個別「左派」組織的轉變加以分析。例如工聯會在八十年代初回歸大

局確定之後的重新參與社會、政治事務，又或者好像愉園如何蛻變成商業化經營以和其他球隊競爭，都更全面補充了對香港「左派」的分析。此外，還有劉翠珊對愛國學校怎樣和教育界主流結合，並在港英及特區政府支持下，完成「主流化」、「正常化」的分析，以及趙永佳和冼基樺討論於電影界銀都電影如何擺脫以往愛國電影界的鬥爭性格，並成為串連中、港、台電影產業鏈的推手，也是有助進一步探討這個社會系統在轉變中的生態環境裏如何演變。

對於香港「左派」的歷史研究，本書還只是初起步。我們暫時能夠瞭解的，只是該社會系統的某些方面而已。儘管有所不足，我們仍希望此文集能在傳統建制和「左派」革命論述之間走出另一條路，並發掘更多不同「左派」團體的歷史，以豐富我們對香港「左派」運動的認識，藉此為戰後香港歷史補上一筆。

最後，我們也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南中國研究計劃贊助本研究計劃，尤其是愉園、南國粵劇團、及《文匯報》之個案研究。亦感謝陳喜萍小姐為本書校對文稿，和亞太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支援本書編撰工作。

## 「六七暴動」的罪與罰：緊急法令與國家暴力

葉健民

「六七暴動」被不少人視為殖民管治的轉捩點，部份意見甚至認為它直接促成麥理浩時期的社會改革。「六七暴動」的而且確令英國人對治港策略重新思考，也令它開始認真檢視九七問題。但七十年代的連串社會改革，還有其他內外因素促成。首先，七十年代的社會改革很大程度上有着政策的延續性因素：港英自五十年代後期開始意識到現有的公共服務，已不足以應付二次大戰後快速增長的人口需求及公眾期望，並已啟動了連串對勞工、教育、房屋以至醫療服務等問題的研究和討論。另一方面，麥理浩的改革也與英國本土政治發展有着莫大的關係。左翼政黨工黨於1974年上台，令倫敦對香港的勞工權益、民生等狀況更為敏感，而英國工業界面對着價廉物美的港貨的挑戰，也從本身利益考慮去批判香港「血汗工廠」的生產模式。英商向英國政府表示對香港勞工福祉表示關注，表面上是要保障勞工權益，真正目的是要增加港商生產成本，從而減低港貨的競爭力。<sup>1</sup>

但姑勿論「六七暴動」是否直接促成日後的社會改革，這場風波確實對殖民地政府構成一次極為嚴峻的挑戰。事實上，在衝突爆發的早期，倫敦初步評估風險時，也曾作過最

1 Ray Yep & Tai-Lok Lui, "Revisiting the Golden Era of MacLehose and the Dynamics of Social Reforms." in Ray Yep (ed.) (2013) *Negotiating Autonomy in Greater China* (Amsterdam: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Press), pp. 110-144.